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模式：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

徐英可, 宋玉飞, 赵娜*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学系, 北京

收稿日期: 2023年5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3年6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3年6月27日

摘要

家庭规模作为家庭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 对个体的行为表现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 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 探究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中的4127份数据以及发放的233份问卷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 1) 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水平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2) 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本研究从家庭结构的角度丰富了以往信任的理论研究, 同时也在实践上也为培育人际信任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家庭规模, 人际信任, 家庭支持

Family Siz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Pattern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Support

Yingke Xu, Yufei Song, Na Zha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Received: May 10th, 2023; accepted: Jun. 14th, 2023; published: Jun. 27th, 202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family size, as one of the

*通讯作者。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family structur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dividual behavior. Family size is closely linked to risk,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s also a psychological state that entrusts risk.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ize on interpersonal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4127 data and 233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in the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amily size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2) Family suppor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iz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cultivating interpersonal trust in practice.

Keywords

Family Size, Interpersonal Trust, Family Support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融合,我国当前人际信任水平呈下降趋势(辛自强, 2019; 杨明等, 2011)。当前已围绕信任的前因变量(朱秋锦等, 2021; Bao et al., 2022)、结果变量(齐春辉等, 2022; Chen et al., 2021)、研究范式(陈欣, 叶浩生, 2009; 贡喆等, 2021)等做了大量的探讨。家庭规模,作为家庭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郭波, 李继明, 1983)。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下,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下的家庭规模也在相应的发生变化。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家庭规模基本保持在5.30人/户,至2010年减少至3.10人/户。2015年10月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后,我国的家庭基本规模有所上升,达到3.35人/每户。家庭规模作为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济学、社会研究领域对其有广泛的关注。但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研究对家庭规模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家庭金融、经济消费等领域(王军, 詹韵秋, 2021; 詹鹏等, 2020; Alsubaiei, 2022; Siman, 2020)。如家庭规模对风险资产配置、持有股票价格、保险购买率等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Badarinza et al., 2016; Li et al., 2022; Shimamura et al., 2018)。

信任作为个体托付风险的心理状态,是一种不确定性行为(Kelley & Stahelsk, 1970),也是一种决策行为(Wieselquist et al., 1999)。研究认为,风险是人际信任建立中的核心变量,在缺少监控和第三方制裁的情况下,任何人际信任行为都会涉及风险(Dohmen et al., 2012)。也就是说,由于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需要承担他人背叛的风险,因而人际信任也属于一种风险投资行为(张建新, Bond, 1993; Malti & Dys, 2018; Xie & Li, 2021)。信任行为是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广泛关注的话题(杨中芳, 彭泗清, 1999; 赵娜等, 2014; Van der Hulst et al., 2023)。那么家庭规模如何影响人际信任行为?其心理机制又如何?因此,本研究拟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以期从个体心理的微观层面分析宏观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进一步揭示当前开放“三孩”人口生育政策背后的社会心理意义。

1.1.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

家庭作为重要的社会稳定器、个体成长和发展的第一场所,已吸引愈来愈多的学者关注家庭规模在

家庭结构与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家庭规模受生育结构、婚姻关系的影响,相比于多子女、已婚家庭,独生子女、未婚家庭的家庭规模一般更小。Blake 和 Judith (1989)曾基于核心家庭维度对家庭人口结构进行考量,主张用核心家庭中的家庭生育规模(父母共同生育的子女数量)来描述家庭规模的大小。加拿大经济学家 Becker (1976)提出的“质量-数量权衡”理论则将家庭生育后代的成本区分为家庭生育质量成本和家庭生育数量成本。在家庭资源恒定有限的前提下,由生育数量带来的家庭规模的上升将会导致家庭后代的养育质量下降。部分研究也证实这一观点,家庭规模的扩大确实导致了儿童成长质量的下降(Qin et al., 2017; Stradford et al., 2017),对儿童的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Bonner & Sarkar, 2018; Prime et al., 2014; Symeonides et al., 2021)。但家庭规模的扩大对个体的影响并非总是负面的。如研究发现来自大型家庭规模的个体通常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Grinde & Tambs, 2016; Kim & Lee, 2022)及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范存仁等, 1994; 郑磊等, 2014)。

家庭规模与风险紧密相连。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投资行为会随着家庭结构,如:家庭规模、人口结构的变动而发生改变(Sorokin et al., 1931)。而对于家庭规模与风险行为之间呈何种关系,学者们普遍持有两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成员数目负向影响风险投资行为,家庭规模越大个体越倾向于持有较低的风险资产占比(郭琳, 2013; Calvet & Sodini, 2014),多生育一个子女会导致家庭或个人风险资产投资总量及占比显著下降(卢亚娟, 刘澍, 2017; 陶建宏, 赵玥, 2020; Galliera & Rutström, 2021)。但也有许多研究表明家庭规模与风险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家庭规模越大,其金融市场参与率以及风险资产配置比重越高(蓝嘉俊等, 2018),创业可能性越高(王菁, 张锐, 2017; 张茜, 蔺楠, 2022),保险的购买需求降低(Ho et al., 2023)。

信任是一种个体特质(Rotter, 1967),是个体托付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Kelley & Stahelski, 1970)。信任的整合模型理论(Mayer et al., 1995)强调,人际信任是在风险感知背景下冒着风险进行的决策或行为。Evans 和 Revelle (2008)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了两个阶段。个体首先会基于交往对象的善良品质、正直品质以及个人能力进行信任意愿评估。若满足则进入第二阶段,个体对可能承受的信任风险进行评定,若风险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则会做出人际信任决策。此过程显示着信任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个体选择信任他人时需要承担受到伤害和背叛的风险。此外, Dunning 等人(2014)提出人际信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风险感知与风险偏好。研究表明,相比于风险厌恶的家庭,偏好风险的家庭对陌生人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Navarro-Carrillo et al., 2018);具有较高风险感知水平的个体对网络银行、在线支付的信任度也较低(Leea, 2009; Yang, 2015)。

综合上述分析,家庭规模能影响个体的风险投资行为,而信任作为风险投资行为的一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规模有关。Cameron 等人(2013)通过调研提出,独生子女具有更低的人际信任水平。这印证了 Dunn (1988)的发现,缺少与兄弟姐妹社会互动的独生子女会表现出更显著的人际不信任。此外,婚姻关系更少的家庭,人际信任程度也更低(Muthukrishna et al., 2021)。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1: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

1.2. 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

家庭作为个体与社会进行沟通交互的基点,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发展,还为个体迈向社会提供了相应的家庭支持资源。已有研究表明,家庭规模与家庭支持正相关。尹银(2011)提出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家庭人力资源越丰富,则越有可能供养残疾人,为其提供家庭支持。家庭规模对家庭支持的积极预测作用在关于老年人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家庭规模越大的老年人获得的家庭支持越高,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的避险资金也越多(张海峰等, 2018; Zimmer & Kwong, 2003)。至于不断缩小的家庭规模会造成何种影响?研究发现,缩小的家庭规模减少了老年人获得的家庭经济支持与家庭情感支持,进一步导致了老年

人有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杨晓蕾, 慈勤英, 2019; Knodel et al., 1992)。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不断小型化的家庭规模弱化了家庭支持功能(孙艳艳, 2015)。

家庭支持与人际信任也有密切的联系。家庭支持属于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从人际交互网络中的家人、重要他人、一般他人处所获得的各类支持性资源是保障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Barrera & Ainlay, 1983)。Cohen 和 Willis (1985)提出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和缓冲器模型, 主效应模型理论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人际交往过程中所必需的心理资源, 能够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而缓冲器模型则从另一个视角将社会支持作为个体面临危机事件的支持性资源, 能够缓冲负面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人际信任作为个体交往过程中的风险行为也伴随着被背叛的危机, 根据缓冲器模型理论家庭支持能够有效缓冲抵御由背叛风险产生的个人危机。

据此, 我们提出假设 2: 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研究思路

本研究拟采用 2 个研究来探讨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首先, 研究 1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进行分析, 从宏观层面初探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其次, 研究 2 从微观个体角度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具体明晰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2. 研究 1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CGSS 2017 数据宏观分析

2.1. 被试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的一项始于 2003 年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 数据覆盖社会、社区、家庭、个体等多个层次。本研究采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调查数据, 最终纳入分析数据 4127 份。参与者平均年龄 50.94 ($SD = 16.92$) 岁, 其中女性 2213 人, 占比 53.62%; 男性 1914 人, 占比 46.38%。

2.2. 变量测量

根据过往相关研究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问题设置, 将家庭规模定义为被访者现存的兄弟姐妹数量(方超等, 2020)。测量题目为 CGSS 2017 问卷中家庭问卷部分题目 D2、D2a: “请问您/您的配偶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包括离家或出生后死亡者)? 其中仍健在的有几位?”。人际信任水平则围绕“信任”与“不信任”两个角度, 以社会态度模块题目 A33: “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 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和题目 A34: “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 您一不小心, 别人就会想办法占您的便宜?”共同评估。剔除“不知道”和“拒绝回答”样本, A34 题目反向计分后, 平均得分越高, 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2.3. 结果与讨论

使用 SPSS 26.0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结果详见表 1。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 = 0.05, p < 0.01$), 配偶现存同胞数量与人际信任水平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04, p < 0.05$)。

研究 1 通过数据库分析初步探明,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家庭规模越大, 个体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验证假设 1。但由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仅能从宏观层面上揭示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 并且针对人际信任的测量仅依靠两道题目概括, 不符合心理学的测量标准。

因此, 后续研究 2 中进一步使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微观层面深挖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Table 1. Study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n = 4127$)

表 1. 研究 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 = 4127$)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1 所有同胞	2.76	2.07	1				
2 现存同胞(家庭规模)	2.35	1.88	0.87**	1			
3 配偶所有同胞	2.84	2.04	0.43**	0.40**	1		
4 配偶现存同胞	2.52	1.95	0.37**	0.40**	0.92**	1	
5 人际信任	6.52	1.32	0.05**	0.05**	0.05**	0.04*	1

注: * $p < 0.05$, ** $p < 0.01$ 。

3. 研究 2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

3.1. 被试

本研究通过互联网招募被试发放问卷, 共回收问卷 241 份。剔除作答时间小于 100s 的问卷, 剩余有效数据 233 份, 有效率 96.68%。被试平均年龄为 28.63 ($SD = 9.16$)岁, 其中女性 114 人, 占比 48.9%; 男性 119 人, 占比 51.1%。

3.2. 研究工具

3.2.1. 家庭规模测量

本研究将家庭规模界定为被访者现存的亲兄弟姐妹数量(方超等, 2020), 因此借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问题表述, 设置题目为“请问您目前仍健在的兄弟姐妹有几位?”。

3.2.2. 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采用 Rotter (1967)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TS)以衡量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人际信任量表(ITS)共由 25 道题目构成, 依据同意程度采用 5 点计分, 1 分表示“完全不同意”, 5 分表示“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对他人所持有的人际信任水平越高(部分题目反向计分)。代表性题目有“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虚伪的现象越来越多了”、“通常父母在遵守诺言方面是可以信赖的”、“多数获选官员在竞选中的许诺是诚恳的”等。在本研究中人际信任量表(ITS)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70, 信度良好。

3.2.3. 领悟家庭支持量表(PSSS-Fa)

由 Dahlem 等人(1991)编制的领悟家庭支持量表(PSSS-Fa)可测量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支持程度, 本量表包含 4 道题, 采用 7 点评分。根据问题表述的同意程度, 1 分表示“完全不同意”, 7 分表示“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家庭支持越强。代表问题有“我的家庭能够切实具体的给我帮助”、“我能与我的家庭谈论我的难题”等。在本研究中领悟家庭支持量表(PSSS-Fa)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78, 信度良好。

3.3. 研究程序

通过线上平台招募被试, 所有被试回答之前, 被告知此次研究目的为调查大众的社会心理态度。问卷回收后, 运用软件 SPSS 26.0 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中介作用检验。

3.4. 研究结果

3.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通过线上发放问卷进行收集,因此采取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研究中涉及的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 12 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共同解释了总体方差变异的 63.1%,其中最大公因子解释了总体变异量的 12.75%,小于 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 尤立荣, 2004)。

3.4.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20, p < 0.01$),且家庭支持分别与家庭规模($r = 0.16, p < 0.05$)及人际信任($r = 0.17, p < 0.05$)呈显著正相关。此外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支持也呈显著正相关($r = 0.19, p < 0.01$),个人收入水平越高,感知到的人际信任水平越强。其他人口学变量与家庭支持及人际信任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s > 0.05$)。

Table 2. Study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n = 233$)

表 2. 研究 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 = 233$)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6	7
1 家庭规模	0.88	1.19	1						
2 年龄	28.63	9.16	0.52**	1					
3 性别	1.49	0.50	0.02	-0.16*	1				
4 个人收入	2.77	1.42	-0.14*	0.25**	-0.27**	1			
5 文化程度	3.17	0.81	-0.33**	-0.48**	0.18**	-0.04	1		
6 人际信任	3.31	0.29	0.20**	0.13	0.01	-0.06	-0.11	1	
7 家庭支持	5.34	1.04	0.16*	0.09	-0.02	0.19**	0.02	0.17*	1

注: * $p < 0.05$, ** $p < 0.01$ 。

3.4.3. 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检验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基于人口统计学信息相关分析结果,家庭支持与个人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本研究以个体本身的家庭规模作为自变量(X),家庭支持作为中介变量(M),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作为因变量(Y)。结果详见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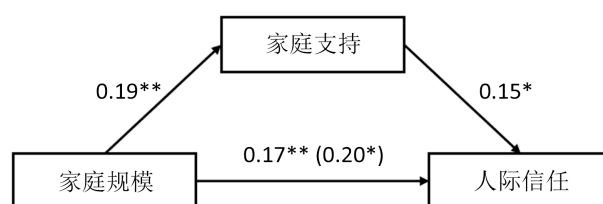
结果发现,家庭规模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领悟到的家庭支持($\beta = 0.19, t = 2.98, p < 0.01$),且家庭支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信任水平($\beta = 0.15, t = 2.28, p < 0.05$)。同时,家庭规模预测人际信任水平的总效应是显著的($\beta = 0.20, t = 3.04, p < 0.01$)。当我们控制家庭支持这一中介变量的作用后,家庭规模仍能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信任水平,个体的家庭规模越大,所持有的人际信任水平也越高($\beta = 0.20, t = 3.04, p < 0.01$)。

本研究路径分析图如图 1 所示。Bootstrapping 检验的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预测个体人际信任水平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Resamples = 5000, Boot = 0.03, SE = 0.14, 95\% CI = [0.001, 0.056]$)。中介效应为 0.03, 占总效应的 14%,即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support in family siz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表 3. 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回归方程		整体方程显著性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i>R</i>	<i>R</i> ²	<i>F</i>	β	95% <i>CL</i> (L)	95% <i>CL</i> (U)	<i>t</i>
人际信任	个人收入	0.21	0.04	5.10**	-0.03	-0.033	0.019	-0.53
	家庭规模				0.20	0.003	0.020	3.04**
家庭支持	个人收入	0.27	0.07	9.05***	0.22	0.068	0.253	3.43***
	家庭规模				0.19	0.057	0.278	2.98**
人际信任	个人收入	0.25	0.05	5.20**	-0.07	-0.040	0.010	-1.02
	家庭规模				0.17	0.010	0.073	2.57**
	家庭支持				0.15	0.006	0.079	2.28*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其中 L(Lower)代表 95%置信区间下限、U(Upper)代表 95%置信区间上限。*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注：括号内数值为总效应，且所有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Figure 1. Path analysis diagram

图 1. 路径分析图

3.5. 讨论

研究 2 从微观个体角度验证研究 1 结果，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该结果与余圣陶和杨倩婧(2017)一项针对大学生被试的人际信任研究结论一致。生长在较大家庭规模中，拥有更多亲同胞兄妹的个体，往往具有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此外，本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验证假设 2。家庭规模作为个体家庭支持的重要预测变量，可以通过家庭支持的心理缓冲作用稀释人际信任带来的不良风险后果，进而提高人们的人际信任水平。综合来看，家庭规模越大，个体越倾向于信任他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扩大的家庭规模提升了个体领悟到的家庭支持水平。

4. 总讨论

本研究结合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验证了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 1 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7)初步探明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拥有同胞兄妹越多的个体其人际信任水平越高。研究 2 使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微观层面上验证研究 1 结果，且发现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4.1.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

研究 1 和研究 2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验证了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个体的家庭规模越大则越倾向于持有更高的人际信任，验证假设 1。从计划生育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三胎政策、鼓励生育，人口政策的变迁不断改变着

我国的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然而,过去针对家庭规模的研究多是由经济学学者基于个体的经济行为指标、采用数学建模的方式、通过公式化计算考察家庭规模与风险投资二者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方法表面上较为客观地测量了个体的风险情况,却忽视了对个体主观风险行为的考量。而随着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重点从“理性人”转移到“社会人”(Thaler, 2016),开始关注家庭规模对于个体心理感知和社会互动行为的影响。

人际信任就是违反“理性人”自利假设的一种亲社会行为(Berg et al., 1995)。前人的研究表明,非独生子女相比于独生子女在合作行为和不公平厌恶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更高的亲社会倾向(黎军, 2021)。本研究发现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家庭规模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提供新的证据。而另一方面,信任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也与个体的风险偏好密切相关。本研究得出结论,个体的家庭规模越大则越倾向于实现人际信任这种高风险行为,这与前人研究相一致。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家庭经济来源越多元化,家庭及个体的风险承担能力也就越强(樊纲治,王弘扬, 2015),相应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进而更容易对陌生人表现出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Navarro-Carrillo et al., 2018)。

在生育政策背景下,本研究中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正相关关系也可以用“同胞互动效应”来解释。“同胞互动”是指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行为的相互影响(Dunn, 1983)。Downey 和 Condrón (2004)提出“兄弟姐妹即资源”的说法,同胞关系是亲子关系的补充,兄弟姐妹共同成长、互相帮助、互相依赖、互相模仿与学习。儿童可以通过与兄弟姐妹重复的日常互动来学习人际交往和社会技能,而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互动机会,提高了社会技能,个体在探索周围环境和发展新的人际关系时有着更多的积极情绪,表现在人际交往上则是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相比任何国家,家庭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均相对较高,在社会关系网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国内学者余圣陶和杨倩婧(2017)也从家庭互动的角度说明来自较大规模家庭中的个体有着更好的适应社会交互背景,进而使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倾向。

2021年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指出由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应当全面开放和鼓励生育。本研究结论也探究得出“三孩政策”及鼓励开放生育背后的社会心理意义。健康生活,需要人际信任的“润滑”。三孩政策的放开在保持经济增长、稳定教育红利、扩大消费的同时(韩瑶,赵欣宇, 2022),更是促进了同胞间的紧密互动,为我们重塑社会信任储备良好资源,对社会稳定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4.2. 家庭支持的意义

研究2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验证假设2。如前所述,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家庭人力资源越丰富,则家庭能够提供的家庭支持越多(尹银, 2011)。其所提供的家庭支持可分为家庭物质支持、家庭情感支持与家庭其他支持三类。已有研究表明,三类家庭支持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从家庭物质支持而言,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照顾者在信任医生方面显著高于经济状况差的照顾者(张卫红,李建民, 2017)。从家庭情感支持角度而言,拥有较高家庭亲密度的个体其人际信任水平更高(汤家彦,姜国瑞, 2009);在家庭中父母温暖情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李珊,刘洋, 2010)。从家庭其他支持角度,例如家庭信息支持而言,家庭成员间信息的共享度越高,家庭中的个体就更倾向于持有更高的信任水平(Martin, 2018)。

从信任的风险属性而言,其与个体的风险感知、风险抵御密切相关。尹秀芳和杨云彦(2014)提出当个体感受到的家庭支持越高时,则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个体的人际信任决策可能遭受被背叛的风险,遭受背叛作为负面生活事件会为个体带来一系列的压力。根据家庭支持的缓冲器模型理论,家庭支持作为一种重大心理缓冲资源,能够有效缓解个体的压力、焦虑等负性情绪(Cohen & Willis, 1985),进而降低个

体的风险感知水平。据此, 家庭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人际信任带来的不良风险后果, 进而随着家庭支持的提升, 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本研究中介机制的探究从家庭支持的角度为培养人际信任提供新思路。何心展(2006)指出家庭功能与领悟家庭支持甚至领悟家庭外支持均呈正相关关系。Beavers (1981)将家庭功能分为家庭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和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五个维度。本研究所关注的家庭规模仅为家庭关系结构维度, 而家庭功能的其他维度也许会通过家庭支持对培养人际信任有着重要作用。在生育政策的支持下, 可能仍存在部分家庭无法通过增加孩子同胞数量而提高其人际信任。但父母作为个体的主要接触对象, 他们的亲密支持也为其提供了一个安全、可信赖的环境, 促使其产生积极的认知和关系评估(Rotenberg & Boulton, 2013), 形成较为稳定的“自我图式”和“他人图式”(Coplan et al., 2019), 进而影响其后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化行为(Chang et al., 2018)。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从婴儿时期出发, 也强调了父母对儿童人际信任水平的培养作用。其指出, 婴儿期的基本任务是发展信任, 克服不信任。在此期间基本的需要能够从父母那里得到满足, 就会建立起信任感, 这也是个体与他人及社会建立良好信任的基础(Erikson, 1963)。因此, 家庭作为个体进入社会的第一场所, 应受到重视。从多个层面为个体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家庭支持, 有利于帮助其学会如何更好的和他人去相处, 从而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提高人际信任水平。

4.3. 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首先, 人际信任可划分为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两部分。已有研究发现, 相比于非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具有更高的特殊信任水平, 而普遍信任水平较低(庞彤彤, 宋凤宁, 2006)。但本研究仅在综合的人际信任层面上考察了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 未来可进一步明晰家庭规模在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中的作用, 考察二者差异。另外,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 其家文化的绝对核心, 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行为表现。本研究仅从个体家庭规模的角度出发考察家庭规模会如何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但由人口生育政策间接影响的家庭结构构成, 如: 老年人占比、儿童占比等, 这也会对个体的身心发展、心理行为的养成产生重要作用。未来可以基于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立足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宏观大背景, 综合考量不同家庭相关因素对社会心理的塑造情况。

参考文献

- 陈欣, 叶浩生(2009). 行为博弈视野下信任研究的回顾. *心理科学*, 32(3), 636-639.
- 樊纲治, 王宏扬(2015). 家庭人口结构与家庭商业人身保险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研究*, (7), 170-189.
- 范存仁, 万传文, 林国彬, 荆其诚(1994). 西安市小学生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品质的比较研究. *心理科学*, (2), 70-74, 127.
- 方超, 曾迪洋, 黄斌(2020). 家庭规模、同胞结构与学龄儿童教育获得——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9(2), 181-192.
- 贡喆, 唐玉洁, 刘昌(2021). 信任博弈范式真的能测量信任吗? *心理科学进展*, 29(1), 19-30.
- 郭波, 李继明(1983). 家庭功能失调与疾病关系的探讨. *医学与哲学*, (12), 22-27, 59.
- 郭琳(2013). 家庭结构对金融资产影响的实证研究. *改革与战略*, 29(12), 65-68, 104.
- 韩瑶, 赵欣宇(2022). “三孩政策”推行中存在的阻力及其对策探究. *理论观察*, (8), 99-102.
- 何心展, 尤海燕(2006). 大学生亲密度和适应性与领悟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人际关系.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12(7), 634-636.

- 蓝嘉俊, 杜鹏程, 吴泓苇(2018). 家庭人口结构与风险资产选择——基于 2013 年 CHFS 的实证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11), 87-96.
- 黎军(2021). *同胞数量与亲社会行为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 李珊, 刘洋(2010).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8(4), 468-470.
- 卢亚娟, 刘澍(2017). 家庭结构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全面二胎”政策的视角. *金融发展研究*, (9), 3-9.
- 庞彤彤, 宋凤宁(2006). 大学生人际信任度研究. *社会心理科学*, 21(1), 63-66.
- 齐春辉, 张振, 张倩倩(2019). 大学新生观点采择、人际信任在自我控制与攻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7(7), 409-415.
- 孙艳艳(2015). 0-3 岁儿童早期发展家庭政策与公共服务探索. *社会科学*, (10), 65-72.
- 汤家彦, 姜国瑞(2009).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7(3), 307-309.
- 陶建宏, 赵玥(2020). 子女数量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 *合作经济与科技*, (5), 58-61.
- 王菁, 张锐(2017). 家庭关爱的力量: 子女数量对创业决定的影响. *经济学动态*, (4), 90-100.
- 王军, 詹韵秋(2021). 子女数量与家庭消费行为: 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财贸研究*, 32(1), 1-13.
- 辛自强(2019). 市场化与人际信任变迁. *心理科学进展*, 27(12), 1951-1966.
- 杨明, 孟天广, 方然(2011). 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 存量与变化——1990-2010 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8(6), 100-109.
- 杨晓蕾, 慈勤英(2019). 居住方式对贫困老年人口社会支持的影响研究. *兰州学刊*, (10), 181-193.
- 杨中芳, 彭泗清(1999).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 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 *社会学研究*, (2), 3-23.
- 尹秀芳, 杨云彦(2014). 农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研究——基于湖北省的调查. *农村经济*, (10), 86-90.
- 尹银(2011). 家庭、社会支持和残疾人服务需求研究. *残疾人研究*, (4), 28-32.
- 余圣陶, 杨倩婧(2017). 交往定向阶段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 34(2), 98-103.
- 詹鹏, 宋蒙蒙, 尹航(2020). 家庭规模小型化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 CFPS2014-2016 年面板数据的研究. *消费经济*, 36(5), 17-28.
- 张海峰, 林细细, 张铭洪(2018). 子女规模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互相卸责 or 竞相示范. *人口与经济*, (4), 21-33.
- 张建新, Bond, M. H. (1999). 指向具体人物对象的人际信任: 跨文化比较及其认知模型. *心理学报*, 25(2), 164-172.
- 张茜, 蔺楠(2022).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如何促进“外乡人”入村创业?——基于家庭规模的视角. *外国经济与管理*, 44(12), 87-102.
- 张卫红, 李建民(2017). 家庭经济状况对患者照顾者信任医生的影响.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 20(6), 753-756.
- 赵娜, 周明洁, 陈爽, 李永鑫, 张建新(2014). 信任的跨文化差异研究: 视角与方法. *心理科学*, 37(4), 1002-1007.
- 郑磊, 侯玉娜, 刘叶(2014). 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 *教育研究*, 35(4), 59-69.
- 周浩, 龙立荣(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 朱秋锦, 张帆, 钟年(2021). 亲亲为大, 亲贤仍重: 亲疏关系、人情取向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心理科学*, 44(6), 1461-1468.
- Alsubaiei, B. J. (2022). Does Family Size Matter to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Mutual Fund Flow in Saudi Arab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https://doi.org/10.1108/IJOEM-09-2021-1441>
- Badarinza, C., Campbell, J., & Ramadorai, T. (2016).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Household Financ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8, 111-144.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315-015425>
- Bao, X., Li, S., Zhang, Y., Tang, Q., & Chen, X. (2022). Different Effects of Anxiety and Avoidance Dimensions of Attachment on Interpersonal Trust: A Multilevel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9, 2069-2093.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221074387>
- Barrera, M., & Ainlay, S. L. (1983).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upport: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1, 133-143. [https://doi.org/10.1002/1520-6629\(198304\)11:2<133::AID-JCOP2290110207>3.0.CO;2-L](https://doi.org/10.1002/1520-6629(198304)11:2<133::AID-JCOP2290110207>3.0.CO;2-L)
- Beavers, W. R. (1981). A Systems Model of Family for Family Therapist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7, 299-307. <https://doi.org/10.1111/j.1752-0606.1981.tb01382.x>

- Becker, G. S., & Tomes, N. (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S143-S162. <https://doi.org/10.3386/w0123>
- Berg, J. E., Dickhaut, J., & McCabe, K. (1995).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0, 122-142. <https://doi.org/10.1006/game.1995.1027>
- Blake, J. (1989). *Family Size and Achiev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ttps://doi.org/10.1525/9780520330597>
- Bonner, S., & Sarkar, D. (2017). The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among Australian Children. *Economic Modelling*, 70, 383-389. <https://doi.org/10.1016/j.econmod.2017.08.010>
- Calvet, L. E., & Sodini, P. (2014). Twin Picks: Disentangl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isk-Taking in Household Portfolios. *Journal of Finance*, 69, 867-906. <https://doi.org/10.1111/jofi.12125>
- Cameron, L., Erkal, N., Gangadharan, L., & Meng, X. (2013). 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cience*, 339, 953-95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30221>
- Chang, C.-W., Yuan, R., & Chen, J.-K. (2018).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88, 128-134.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8.03.001>
- Chen, Y., Yu, C., Yuan, Y., Lu, F., & Shen, W. (2021). The Influence of Trust on Creativity: A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Article 706234.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706234>
-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 310-357.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98.2.310>
- Coplan, R. J., Reichel, M., & Rowan, K. (2009).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Maternal Personality, Child Temperament, and Parenting: A Focus on emO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6, 241-246.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8.10.011>
- Dahlem, N. W., Zimet, G. D., & Walker, R. (1991).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 Confirmation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2, 756-761. [https://doi.org/10.1002/1097-4679\(199111\)47:6<756::AID-JCLP2270470605>3.0.CO;2-L](https://doi.org/10.1002/1097-4679(199111)47:6<756::AID-JCLP2270470605>3.0.CO;2-L)
- Dohmen, T., Falk, A., Huffman, D., & Sunde, U. (2012).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isk and Trust Attitud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9, 645-677. <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r027>
- Downey, D. B., & Condron, D. J. (2004). Playing Well with Others in Kindergarten: The Benefit of Siblings at Hom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333-350.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4.00024.x>
- Dunn, J. (1983). Sibling Relationships in Early Childhood. *Child Development*, 54, 787-811. <https://doi.org/10.2307/1129886>
- Dunn, J. (1988). Sibling Influences on Childhoo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9, 119-127.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1988.tb00697.x>
- Dunning, D., Anderson, J. E., Schlösser, T., Ehlebracht, D., & Fetchenhauer, D. (2014). Trust at Zero Acquaintance: More a Matter of Respect than Expectation of Rewar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07, 122-141. <https://doi.org/10.1037/a0036673>
-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orton.
- Evans, A. M., & Revelle, W. (2008). Survey and Behavioral Measurement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 1585-1593. <https://doi.org/10.1016/j.jrp.2008.07.011>
- Galliera, A., & Rutström, E. E. (2021). Crowded out: Heterogeneity in Risk Attitudes among Poor Households in the US.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63, 103-132. <https://doi.org/10.1007/s11166-021-09363-8>
- Grinde, B., & Tambs, K. (2016). Effect of Household Size on Mental Problems in Children: Results from the Norwegian Mother and Child Cohort study. *BMC Psychology*, 4, Article No. 31. <https://doi.org/10.1186/s40359-016-0136-1>
- Ho, C., Teerawichitchainan, B., Tan, J., & Lie Tan, E. R. (2023). Risk Attitudes in Late Adulthood: Do Parenthood Status and Family Size Matter? *Research on Aging*, 45, 423-437. <https://doi.org/10.1177/01640275221116091>
- Kelley, H. H., & Stahelski, A. J. (1970). Social Interaction Basis of Cooperators' and Competitors' Beliefs about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66-91. <https://doi.org/10.1037/h0029849>
- Kim, J., & Lee, E. (2022). Association between Healthy Eating Index and Mental Health in Middle-Aged Adults Based on Household Size in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 Article No. 4692.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084692>
- Knodel, J. E., Chayovan, N., & Siriboon, S. (1992). The Impact of Fertility Decline on Famili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An Illustration from Thailan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8, 79-103. <https://doi.org/10.2307/1971860>
- Leea, M. C. (2009).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doption of Internet Banking: An Integration of TAM and TPB with Perceived Risk and Perceived Benefit.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8, 130-141.

- <https://doi.org/10.1016/j.elerap.2008.11.006>
- Li, C., Wang, L., Luo, R., Ning, G., Zhao, P., & Yu, X. (2022). Complexity between Ag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Marke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Complex*, 2022, Article ID: 5226827. <https://doi.org/10.1155/2022/5226827>
- Malti, T., & Dys, S. P. (2018). From Being Nice to Being Kind: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 45-49.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7.07.036>
- Martin, S., Forde, C., Horgan, D., & Mages, L. (2018). Decision-Making by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the Home: The Nurture of Trust, Participation and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7, 198-210.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7-0879-1>
- Mayer, R. C., Davis, J. H., & Schoorman, F. D. (1995).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709-734. <https://doi.org/10.2307/258792>
- Muthukrishna, M., Henrich, J., & Slingerland, E. (2021). Psychology as a Histor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2, 717-74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082820-111436>
- Navarro-Carrillo, G., Valor-Segura, I., & Moya, M. (2018). Do you Trust Strangers, Close Acquaintances, and Members of Your Ingroup? Differences in Trust Based on Social Class in Spai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5, 585-597.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6-1527-7>
- Prime, H., Pauker, S., Plamondon, A., Perlman, M., & Jenkins, J. (2014). Sibship Size, Sibling Cognitive Sensitivity, and Children's Receptive Vocabulary. *Pediatrics*, 133, 394-401.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2-2874>
- Qin, X., Zhuang, C. C., & Yang, R. (2017). Does the One-Child Policy Improve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in Urban China?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5, 287-303. <https://doi.org/10.1016/j.jce.2016.09.001>
- Rotenberg, K., & Boulton, M. (2013). Interpersonal Trust Consistency and the Quality of Peer Relationships during Childhood. *Social Development*, 22, 225-241. <https://doi.org/10.1111/sode.12005>
- Rotter, J. B. (1967). 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5, 651-665.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67.tb01454.x>
- Shimamura, Y., Matsushima, M., Yamada, H., & Nguyen, M. (2018). Willingness-to-Pay for Family-Based Health Insurance: Findings from Household and Health Facility Surveys in Central Vietnam. *Global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 10, 24-35. <https://doi.org/10.5539/gjhs.v10n7p24>
- Siman, S., Tawakal, M. A., Risamasu, P. I., & Kadir, R. (2020). Effect of Household Size, Working Hours, Health and Income o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Poor Household. *Enfermería Clínica*, 30, 512-515. <https://doi.org/10.1016/j.enfcli.2019.10.131>
- Sorokin, P. A., Zimmerman, C. C., & Galpin, C. J. (1931). *A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 Vol-1*.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tradford, L., Van Poppel, F., & Lumey, L. H. (2017). Can Resource Dilution Explain Differences in Height by Birth Order and Family Size? a Study of 389,287 Male Recruits in Twentieth-Century Netherlands.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22, 214-235. <https://doi.org/10.1080/1081602X.2016.1230510>
- Symeonides, C., Vuillermin, P. J., Sciberras, E., Senn, E., Thomson, S., Wardrop, N., Anderson, V., Pezic, A., Sly, P. D., & Ponsonby, A. (2021). Importance of Accounting for Sibling Age When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mily Size and Early Childhood Cognition, Language and Emotional Behaviour: A Birth Cohort Study. *BMJ Open*, 11, e041984.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20-041984>
- Thaler, R. H. (2016). *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W. W. Norton & Company.
- Van der Hulst, F. J., Brabers, A. E., & de Jong, J. D. (2023). The Relation between Trust and the Willingness of Enrollees to Receive Healthcare Advice from Their Health Insurer.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3, Article No. 52. <https://doi.org/10.1186/s12913-022-09016-9>
- Wieselquist, J., Rusbult, C. E., Foster, C. A., & Agnew, C. R. (1999). Commitment, Pro-Relationship Behavior, and 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942-96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7.5.942>
- Xie, B., & Li, M. (2021). Coworker Guanxi and Job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71, Article ID: 120981.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1.120981>
- Yang, Q., Pang, C., Liu, L., Yen, D. C., & Michael Tarn, J. (2015). Exploring Consumer Perceived Risk and Trust for Online Payments: 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s Younger Gener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0, 9-2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3.058>
- Zimmer, Z., & Kwong, J. (2003).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Demography*, 40, 23-44. <https://doi.org/10.1353/dem.2003.0010>